

民族工作參考材料

第十五輯

廣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印

一九五六年一月

國務院關於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指示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各地積極地推行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在建立相當於縣或縣以上的民族自治區的同時，也建立了一百零六個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和許多相當於鄉的民族自治區。這對加強民族團結、發動少數民族人民參加人民民主政治活動、提高少數民族自己管理國家行政機關的信心和積極性以及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等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根據幾年來的經驗，在只有一個相當於區或相當於鄉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內，事實上不可能完全行使憲法中規定的各種自治權，因而不需要建立自治機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條中關於民族自治地方劃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的規定以及關於建立民族鄉的規定，過去建立的相當於區的和相當於鄉的民族自治區必需予以更改。除了更改相當於鄉的民族自治區問題在國務院「關於建立民族鄉若干問題的指示」中另有規定外，對於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問題作如下的指示。

全國已建立的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情況是很複雜的。有的是建立在還沒有實行區域自治的同一民族的較大的聚居區以內的；有的與同一民族的自治州、自治縣相鄰近；有的與建立在其他縣內的同一民族的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相鄰近；有的與同一縣內建立的同一民族的其他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相鄰近；有的與同一縣內建立的不同民族的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相鄰近；有的則不鄰近任何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或自治地方。各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人口和面積也很懸殊，其中人口最多的達三萬一千餘人，最少的只九百餘人；面積最大的達四萬平方公里，最小的只幾平方公里。

鑒於上述的複雜情況，各地對於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

束各該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機關以後，分別設立區公所，各區內少數民族聚居的鄉，改建為民族鄉。

(六) 對於不鄰近任何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或自治地方的一個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應該結束自治機關，設立區公所，區內少數民族聚居的鄉，改建為民族鄉。但個別民族關係顯著或地區特別大的，可以將那個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改建為自治縣；或者以那個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為基礎，適當劃進一部分鄰近地區建立自治縣；或者將那個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所在的縣改為自治縣。

(七) 對於在城市內建立的民族自治區，在設區的市，將自治機關結束後，成立區人民委員會；在不設區的市，將自治機關結束後，設立街道辦事處。

在以上辦法中，凡是將自治機關結束後設立區公所的，應該保留原來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機關的編制。那個區公所雖然和一般區公所一樣是縣人民委員會的派出機關，但為照顧當地民族的情況；那個區公所應該以原來實行區域自治民族的人員為主要成份組成；並且在執行職務時仍然採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和注意當地民族的特點。

各有關的省、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應該根據上述辦法，並且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訂出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計劃，報告國務院批准後實行。

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是一項涉及民族關係的複雜而細緻的工作，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引起少數民族的不滿，影響民族團結，因此各地必須切實執行慎重穩進的方針。應該做好調查研究，了解清楚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各種有關情況，特別是民族關係的情況，應該同當地民族代表充分進行協商，並且取得他們的同意後再去着手更改，否則寧可暫緩處理；應該對自治機關的領導人員和部幹作妥善的安置，並且應該在着手更改以前就作好安排；應該向當地各族人民進行深入的宣傳解釋工作，一定要使廣大羣眾認識到更改相當於區的民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使這一工作在廣大羣眾自覺自願的情況下進行。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民族團結，也

健康的。但是檢查我們在運動中的指導思想，却曾經有過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過分地強調了青海地區民族關係的特點，宗教信仰的特點；過多地顧慮了當地經濟、文化發展落後等情況，不敢大胆地、積極地放手發展，片面地強調所謂「慎重穩進」。如1954年經過總路綫廣泛宣傳，就有很多農民要求辦社，根據當時情況，是完全可以多辦一些的。但是由於我們的預見性不夠，計劃偏低，控制過嚴，傷害了部分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貴熱情。根據互助土族自治縣調查，當時積極要求入社的互助組就有八十一個（六百戶），但是經縣委批准轉社的只有兩個（二十二戶），致使未被批准的農民不滿，有的說：「你們宣傳過渡，我們脫了腳，你們又拉着腿」。有的農民說：「沒有幹部領導，我們也要辦，不批准也要辦」，有些幹部還加以勸阻；但是，該縣羣衆仍然辦了九個所謂「自發社」，並且都辦得不壞。有些幹部當時還批評他們是「圖名譽、爭光榮，錦標思想，動機不純」。後來，省委於5月份召開了農業區第一次區委書記會議，7月份又召開了省的首屆黨代表大會，嚴格地批判了當時的右傾思想，基本上克服了保守情緒，使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畢竟由於我們社會主義思想水平不高，對農村社會主義羣衆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的一些徵候缺乏應有的敏感，不善於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抓住問題的本質和主流的方面，因此曾經一度發生過猶豫。直至學習了毛澤東同志今年7月31日「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以後，才認識到我們有右傾保守情緒，從而明確了方向，看清了形勢，壯大了胆量。

爲了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根據青海省實際情況，經省委研究，並且徵詢了農業區各縣委的意見，提出1956年至1959年農業合作社發展的規劃：1956年合作社要發展到二千二百零五個，入社農戶要達到農業區總農戶的百分之三十二；1957年合作社要發展到三千五百三十七個，入社農戶要達到百分之五十五；1958年合作社要發展到四千五百二十三個，入社農戶要達到百分之七十五；1959年合作社要發展到四千六百八十

起合作社，增產就特別顯著，極易顯示合作社的優越性。根據1953年十個合作社的統計，合作社比個體農民產量高百分之二十二點五；1954年三十五個合作社統計，合作社比個體農民產量高百分之二十九點五；今年川水地區的小麥每畝產量多在四百斤以上，個別有高達八百八十斤的；有的社甚至高出當地個體農民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互助土族自治縣白馬鄉的團結社，今年在四百多畝碱灘地內用了一百五十個人工，花了四十天時間，鋪了一層崖土、河泥、路土，使每畝產量由過去平均不到二百二十斤（最低七十斤），提高到平均三百五十斤（最高達六百斤），所以社外羣衆反映說：「合作社力量大，把『乾碱灘』變成了『豐產地』，真是『衆人是聖人』。」

三、農業合作化運動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民族團結，使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關係。事實證明：凡是有了合作社的地方，民族關係也就呈現出一種新的氣象。臺源回族自治縣回漢兩族農民聯合組織的團結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回民閉齋期間，合作社就少讓他們開會，少給他們分配農活或分配一些輕勞動，以便利他們作禮拜和休息。在平時，漢民社員還幫助回民社員學習生產技術，有意識地多讓他們進行生產，以便於補償因作禮拜所耽誤的勞動日，回民社員很受感動。同樣回民社員也對漢民社員十分體貼，當快過春節的時候，合作社要去拉木料，回民社員就主動提出讓回民社員去，以便漢民社員有時間去準備過年的東西。由於雙方友誼和感情的加深，有時回漢社員在生活習慣上彼此稍有疏忽，或回漢社員之間發生了口角，也不會牽涉到民族關係。

所有這些就激發、吸引了各族廣大農民要求參加合作社的積極性。因此，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與此相適應，否則就會犯錯誤。

幾年來我們深深感到：在多民族地區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確是一項繁重而複雜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深入各族農民羣衆，做艱苦細緻的工作，認真做好民族、宗教上層的統一戰綫工作，並重視在少數民族中建黨、建團、積極培養幹部，大規模發展合作社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辦好的。也只有通過農業合作化運

動，才能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共同努力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步消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一切消極等待和束手束腳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加以克服。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光明日報）

根據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 辦好民族聯合社

農業合作化是我國各民族農民殷切的願望和共同的意志。我國各個少數民族地區，除個別沒有實行土地改革還沒有互助合作組織的邊疆地區和某些互助合作運動基礎比較薄弱的地區外，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到來。在多民族地區，由於民族聚居和雜居，合作化運動中不但建立了許多單一民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已經出現了许多由兩個或幾個民族農民聯合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如內蒙古自治區，在今年8月前建立的六千九百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由蒙古、漢兩族農民聯合組成的有九百二十三個，由蒙古、漢、回、滿、朝鮮等族農民組成的有三十七個，桂西僮族自治區已經建立起近兩千個民族聯合社；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民族聯合社已有九十四個；甘肅省由兩個民族以上聯合組成的農業社有三百三十八個，佔該省少數民族農業區的農業社一半以上；在雲南省的一萬二千個少數民族農業社中，也有很多是多民族聯合組成的，如在路南縣圭山區的九十八個社中，兩個民族以上的農民聯合組成的就有四十五個；在青海省秋前建立的八百七十六個農業社中，單一少數民族的農業社之外，由兩個到五個民族聯合組成的農業社佔百分之三十二。這些事實有力地證明了在有條件的少數民族地區不但能够辦單一民族的農業社，而且能够辦好各民族聯合組成的農業社。

提到辦民族聯合社，曾經有人這樣憂慮：「親兄弟還合不在一

起，不同的民族怎麼能合攏搞生產！」當然，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但是，由於歷史遺留的原因，這種憂慮如果產生在有些少數民族農民羣衆中，那也是很自然的。只要能作出示範，羣衆的這種顧慮就會消除。廣西省平果縣孟豆鄉瑤、僮族農牧生產合作社在建社前，有些人存在着這種看法，但是他們從建社以後的實際生活中却深刻體會到，民族聯合社是民族團結友愛的大家庭。青海省民和縣和平鄉沙塆溝農業社的回、漢族農民團結辦社、搞好生產的事實，就消除了一些人的這種不必要的顧慮，社外回、漢族農民紛紛要求入社；已提出入社要求的馬朱麻說：「過去我總覺得回、漢族農民一起辦社有很多不方便，可是現在沙塆溝的樣子明擺下了，回、漢族農民不但能在一起辦社，而且能辦得十分好。」

也曾經有人認為：各族人民生產習慣不同，生產技術又各有高低，這是辦民族聯合社的障礙。事實證明，這並不是辦民族聯合社不可克服的困難，它在許多地區已經得到了解決。如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漢兩族人民各從事不同的生產，但是在不少的民族聯合社裏，各族社員之間，因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充分發揮了蒙古人善於飼養牲畜，漢人善於種地的長處，使農牧業生產都得到了發展。在各地許多回、漢民族聯合社裏，回族人民由於歷史原因農業生產技術較差，可是在漢族人民主動的幫助下，都提高了生產技術，發展了生產。在廣西、雲南苗、瑤、侗等民族地區，住在山地和住在平壩的各族農民的生產技術各有所長，聯合建社後，在生產上都能够發揮了各族農民的特長，互教互學，改進了生產技術，發展了生產。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本質和主流，全國少數民族地區在解放以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扶助，貫徹執行了民族政策，迅速地安定了社會秩序，絕大部分地區已經先後完成了土地改革，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各項建設事業都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民族幹部也大量成長起來了，民族地區的黨的組織已經相繼建立起來，各民族勞動人民對黨和人民政府已經有無比崇高的信任，加以各民族間的親密團結，這

六十左右的農民缺少半年左右的糧食。1952年曾組織過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的農民移民開荒。但當時只是在個體經濟上去扶持，沒有和社會主義改造相結合。這樣，生產發展雖快，同時也產生了農村中的兩極分化，第三年就出現了富農。接受這一教訓，分析景頗族社會情況，我們認識到讓其自然發展來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扶助個體經濟只能促進階級分化，發展資本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他們的貧困和落後的問題。我們知道，偉大的蘇聯，對於如何幫助從前落後的各族人民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有豐富的、科學的經驗的。蘇聯的經驗說明，發展民族地區的工業是很重要的，同時農業的集體化對於落後的各族人民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則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些地區人民是以務農為主的。因此，我們在1954年，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開始組織景頗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便隨着生產關係的改變，生產的發展，必要的民主改革的逐步進行，來促進景頗族的進步。1954年，我們試辦了四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三個社是開荒辦起來的，一個社是就地發展的。平均每戶貸款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目前，除一個社因領導不善，增產較少外，三個社增產特別顯著。最多的增加二倍半，社員收入增加一倍到五倍。盈江縣芒撒社今年又在1954年的基礎上增產百分之八十。

在景頗族農民中組織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增加了生產，改善了農民的生活，而且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過去這個地區，帝國主義分子以傳教為名，曾經長期進行活動，欺騙羣衆。現在羣衆開始覺悟起來了，不聽他們那一套了。這對我們邊疆的鞏固，和帝國主義作鬥爭是有重要意義的。同時，景頗族和當地傣族、漢族的團結也進一步加強了。過去，景頗族人民由於生活所迫，有時引起當地民族糾紛，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傣族人民有的就說：「景頗族現在走着毛主席的路，和過去不同了。」他們之間已能共同興修水利，互助開荒生產，互相借用耕牛和農具。辦社之後，景頗族內部關係也有了變化，加強了民主和團結。合作社逐步建立了按勞取酬和生產的民主管理制度，對原始的平均主義的分配

習慣、平均主義的思想和由此產生的集體勞動的不積極，生產無人負責的現象，都逐漸有所克服。他們和上層山官之間，也出現了民主協商氣象。中小山官有的參加了合作社，積極勞動，而且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此外，辦社之後，農民的文化提高也比較快。景頗文是拼音文字，較容易學，芒撒社辦了八個月夜校，已教會全體社員看景頗文報，（我們辦的「團結報」，有傣文、景頗文、傈僳文版。）很多社員已經可以寫信了。伴隨着有關生產的自然科學教育和醫藥衛生工作的開展，嚴重破壞景頗族生產的殺牛祭鬼的習俗已經開始有了改變。

通過農業合作化，提高了景頗族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發揚了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這就給在景頗族中建黨創造了條件。現在我們已試建了兩個支部。

經濟、文化落後的民族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我們國家中是可能的。以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講，有了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上的大力幫助，和羣衆擺脫貧困的迫切要求，加上地區的自然條件好，在同原有生產情況對比之下，合作化的優越性是十分顯著的。所以以務農爲主的景頗族人民經過農業合作化的道路，結合必要的民主改革，直接地、但是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當然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落後狀態的存在，合作化過程中的困難還是很多的。我們只是作了初步的試點工作，還需要深入摸索和積累經驗。

（二）移民開荒組織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在保山區的怒江壩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區的五個平壩區，都是亞熱帶地區，有着大片荒地，可以種植技術作物，增產工業原料和出口物資，支援國家的工業化。但是，當地勞動力缺乏，生產技術落後。本省內地都是人多田少。隨着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在不妨害合作社就地增產原則下，可動員一部內地人力移民開荒。同時還可以幫助少數民族的發展和進步。1954年冬季，我們在民族關係較好的怒江壩試辦了五個移民開荒合作社，共三百二十個勞動力。經

的生產情緒，這是開荒社第一年獲得豐收的重要條件。

五、必須十分重視民族團結。開荒地區都是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原因，我們必須注意克服大民族主義情緒和地方民族主義情緒，注意敵人的挑撥和破壞。同時，水利、牧場的使用和放牧習慣，風水迷信等許多具體問題也還存在。由於我們首先在漢族農民中進行了絕不侵犯傣族利益、尊重傣族風俗習慣的教育，又在傣族農民中進行了共同發展生產支援國家工業化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為開荒建立的合作社是對他們只有好處沒有損害，因此現在民族關係是好的。

六、發展國家需要的，有銷路、價值高和便於運輸的經濟作物。我們開荒地區距離昆明八百多公里到一千公里，只有一條公路，所以應該重點發展棉花（木棉）、咖啡、紫膠、劍麻等。甘蔗、糧食產量雖高，但調運不出去，暫不發展。

依據以上經驗，我們計劃1957年前移民一萬二千個勞動力，開荒十萬畝，加上景頗族、傈僳族的開荒合作社、當地傣族的合作社和軍墾農場，1957年可植棉八萬畝，咖啡八萬畝，劍麻五百萬株，紫膠二十萬株。至1960年產值將相當於全區糧食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人民生活將有相當提高。這個計劃對我們邊區來說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合作化才能完成。當然目前困難仍然很多，亞熱帶技術作物的種植問題急待進一步解決。衛生幹部不足，商業工作和加工業須要進一步配合等等，這些擺在面前的實際問題，正在設法解決。

以上兩個材料說明：

一、要想提高邊疆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改變邊疆的經濟文化面貌，以求邊疆的更加鞏固，和人盡其才、地盡其力以支援國家工業化，只有依靠合作化——社會主義，而不能依靠資本主義。因此對邊疆的合作化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而不應當採取消極等待的態度。

二、合作化不只內地漢族區需要和能够辦好，邊疆落後地區民族人民也是需要和能够辦好的。雖然困難更多，但只要不違背？

法則，經過我們的努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給我們指明了前進的道路，我們決心更好地團結和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任務而奮鬥。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

在民族雜居、居住極其分散的貧瘠高寒山區也能 把社辦得更多更好

中共紫雲縣委書記 武守才

學習了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的文件，和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結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在認識上進一步澄清了不少問題，批判了過去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思想。為了積極地有計劃地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我們根據「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對我縣今後農業合作化和生產的發展作了初步規劃。

在紫雲縣這樣一個民族雜居、居住極其分散的貧瘠高寒山區，合作社和生產是不是能發展呢？現談談個人意見。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比較落後，民族關係複雜，農民在生產、風俗習慣上有差異，這是不同於一般地區的。因之，我們在工作中應該採取慎重的態度去加以注意；但同時我們更應看到，我縣境內一般地廣人稀，生產方式落後，生產工具簡單，耕作技術粗放，自然災害多，農業產量低，因之，在廣大農村中貧困和尚不富裕的農民在農民中還佔着很大比例。據少數民族聚居的火烘鄉調查，共有貧農和下中農佔總戶數的

入折谷二四四二七斤，比去年增產百分之二七三，大洞社在該區該鄉的合作化浪潮中是一面飄揚的紅旗。

大洞社所以能够取得這樣成績，主要是鄉支部在具體領導這個社中正確的貫徹了民族政策的結果。

這個社的社員分住在四個屯子，遠的相距兩里，近的也有一里，聯合建社時認真進行了兩條道路和政策教育，貫徹「口願、心願、全家願和民族間相互願」的四願教育，真誠協商，完全在自願的基礎上，才進行報名入社。

建社轉入生產後，當時正是冬月，漢族社員覺得太辛苦，不肯出工，開會不願參加，漢族社員伍祥雲還想退社，瑤族社員也有意見，認為他們狡猾，支部及時的進行民族團結、發展生產的教育，互相尊重幫助，並提出團結一定要主動，這樣，凡是開會瑤族社幹都主動的到漢族社員住的屯子去開，又輪換幹部參加漢族僮族的生產小組帶頭出工，串連幫助，漢族社幹社員都很受感動，漢族社幹蘇光福說：「他們（指瑤族）這樣來團結我們，再三心二意太對不起他們了」後來開會都輪流在各屯子來開，出工也積極了。開始過民主生活時，各族社幹社員只對各族社員提意見，感情增進互相了解了才共同互相提意見幫助。凡是開會，社員未到齊和未正式開會時，各民族講各民族的語言，正式開會和討論時，都說普通話，使得人人懂得不懷疑，風俗習慣也能互相尊重，今年農曆四月初八，瑤族習慣忌動土用牛，尤其老年人忌的最深，爲了這個問題開了個會來商量，瑤族幹部提出：這個忌日僮族漢族他們都沒有習慣，如果都要跟從我們，還不够好，應該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漢族社員提出「還是以你們的意見爲主，大家休息一天吧」，大家親熱得像一家人一樣。瑤族見漢族和僮族都這樣尊重他們的習慣，結果不但不堅持，還說：他們沒有這個習慣，我們也不要忌了，支部書記兼社長提出，願忌就忌，不忌的就出工，大家非常滿意。當天，瑤族社員也有很多出工用牛的。

過去民族間的情感是不够頂融洽的，瑤族婦女去趕墟過白水漢族村子，互相間是沒有什麼招呼，瑤族婦女打的草鞋到白水賣要低

像今年春，有一單幹戶，卅石田受旱，落雨了搶耙搶插不行，有的還未犁完，又都未剷着田畦，眼看過了季節，這時社裏的田插完了，本來要及時扯包谷草，結果全社動員先去幫這戶單幹搶插，三天時間，搶耙搶插完成。取得社外農民異常好感，由於他們社和社外的關係搞得好，插正了紅旗，這次合作化規劃，社外附近的農民，紛紛要求擴大他們的社，遠隔四里地的源頭瑤胞，也要求參加他們，不打算單獨建社。

李方軍 十二月十五日於龍勝

一個民族聯合社的成長

——記安寧渠區六鄉黨支部辦社經過 雲天、高庚

場上，這裏放着一堆麥子，那裏放着一堆包米，飽滿的顆粒，令人心愛。男女社員，有的拉着馬，有的牽着牛，有的肩上搭着一條口袋，懷着喜悅的心情，把分給自己的糧食運回家去。老年人捋着鬚鬚，看着青年人在忙碌，神情專注地看着會計把一捲一捲的農業副業收入的錢，分給每一個人，他們滿意地說：第一年嘛！每個勞動日就能分到三塊一毛多錢，很可以了。

這是烏魯木齊縣安寧渠區六鄉二村紅星農業社秋收分配的最後一天。

紅星社是今年二月間建立起來的，共有二十九戶。其中有十七戶漢族、七戶維吾爾族、四戶回族和一戶蒙族。社裏除一戶老中農外，其它都是貧農。入社土地共一千五百三十一畝，牛十八頭，馬十四匹，大車四輛。

這個民族聯合社的成長，會長過一段艱苦曲折的歷程，由於這個鄉黨支部的堅強領導，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黨員們發揮了模範作用，終於使它一天天地成長起來，並且一天比一天更加鞏固。

個人。當時任務重，時間緊，怎辦呢？支部就號召大家學習使用新式步犁，並要求黨員們以模範行動影響社員，吉布曾想自己是個共產黨員，雖說這裏的婦女沒有參加過犁地，自己爲什麼不能帶頭試一下呢？她報名了。這個從小就給人牧羊牧馬的蒙族婦女，解放後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土地，倉裏有了餘糧，她完全懂得這些好處是從那裏來的。所以她積極響應了黨支部的號召，努力學習，用一天半時間，就掌握了使用新式步犁的技術，爲了不誤農時，她就整天扶着洋犁、趕着牲口，和男社員一樣參加到春耕工作中去。在她這一實際行動的影響下，李秀英、吐爾遜汗、海力其汗（維吾爾族）等女社員也很快學會犁地了。

紅星社建立快一年了，在這一年中，各民族社員團結得很好。社裏漢族社員多一些，但是他們都能照顧和尊重兄弟民族社員的風俗習慣。譬如漢族女社員都願意養些豬，增加家庭收入，可是，從前，誰也不注意把豬圈起來，自打社建立起來以後，她們都把豬圈起來了，因此，養豬並沒影響民族間的團結。社裏維吾爾、回族社員們每天要做「乃嗎子」，不管社裏活忙活閒，漢族社員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二話。正當夏收繁忙季節，庫爾班節到了，社裏給維吾爾和回族社員們放了三天假，庫爾班節那天，社主任王宗清和副主任吉布曾帶領着全體社員去給維吾爾、回族社員們和社外的農民拜年，到處充滿着團結友愛的氣氛。這些使少數民族社員深深感動，他們說：我們住在這裏多少年了，漢、蒙族人給我們拜年這還是第一次，在毛主席領導下，大家真正成了一家人了。

社裏爲了提高勞動效率，買了四架新式步犁，租用了一架播種機和一架割麥機。支部曾經號召社員們學習使用新式農具的技術。民族社員們熱烈響應了支部的號召，楊萬祿（回族）過去見也沒有見過十行播種機，但在張學仁和青年團員王金玉的幫助下，不但學會了使用，而且學會了修理技術。維吾爾族社員歐斯曼、吐爾遜也在這種情況下，熟練地掌握了新式農具的使用方法。

建社初，黨支部就會經研究過建社的目的和任務，認定要使全村的貧困戶都能組織起來，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要使村裏鰥寡孤獨

因此，在山區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有它困難的一方面，但是由於山區農民多年來遭受封建勢力的統治壓迫較深，生產技術落後，農民生活貧困，要求走合作化道路也迫切，這就形成發展合作化運動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同時由於山區生產潛力大，也要求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發掘山區生產潛力，改變山區的面貌，使山區農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所以，山區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走合作化道路的。我們原計劃建立一百八十個農業合作社，但是由於羣衆紛紛要求，結果，建立了一百九十七個農業合作社，現在鄉鄉都有合作社。經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也說明了廣大山區農民是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黨也是能够領導山區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

經過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我們對在山區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必須解決的一些政策問題，有一些體會。因為山區的地形、土質、氣候複雜，生產情況各有不同，中貧農所處的經濟地位和生產資料的佔有也各有不同，所以，在處理山區合作化運動中的政策問題，也就必須根據山區的特點，堅持半社會主義性質，貫徹自願互利原則，因此，也要領導上必須克服一般化的領導方法，深入實際，充分與羣衆商量，正確解決具體問題，這也是山區互助合作運動順利發展和鞏固的主要環節之一。

因此，在土地評產入社問題上，我們是根據山區特點，以三年實產量為主，適當照顧土地質量的辦法，將社員的土地評產入社。在最初我們對這一點並不是很明確的，因此，曾採取分等劃片找標準地的辦法評產，以為這樣貧農才不會吃虧，結果，中貧農都不滿意。如油房合作社共有十三戶，就因採取這種辦法有十二戶的產量評的不合理，中農蔡天福收二十六石的產量只評了十九石，蔡天福嫌產量低，思想抵觸想退社，貧農鳳順明收九石的產量只評了七石，鳳順明也有意見，由於評產不切合實際，結果，貧農、中農都有意見，後來，改為以三年的實際產量為主，適當的照顧土質的辦法，正確進行評產，社員們才滿意了。原來想退社的中農蔡天福也說：「這回差不多了。」另外，高寒山區因廣種薄收，耕地不固定，農民一般嫌評產麻煩，不願意評產，說：「我們這裏丟的丟，開

的開，有什麼評場。實際上也是這樣，如大地鄉光明農業合作社的土地，就是種一年歇一年，種一年歇三年，種兩年歇三年或種三年歇四年，邊開邊丟。在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的時候，他們在計算產量當中，就丟了二石七斗種的地，由於輪種，品種的產量相差也很大，如同一塊土地，種洋芋一斗可產四斗到六斗，種蕎一斗就只能產一斗到三斗，合洋芋一斗五升到四斗五升，相差很大。根據這個情況，我們反覆說明土地評產的重要性，動員農民認真進行土地評產，並且進行土地排隊評產，將輪歇地排了輪歇規律，評出栽種年的常年產量，然後評產入社。至於社員新開的生荒地，則不按照新開年的產量評產，而按照同等土質評產，輪種的品種也按其產量評產入社。這樣解決以後，羣衆也都滿意。在經濟作物的評產入社的問題上，我們是採取按其品種的質量好壞，年限長短等評產入社。在經濟作物地區，各種經濟作物的品種繁多，各有不同，如元蘇在品種上就有大紅腳綠、小紅腳綠、泡桐蘇、青桿蘇等；桐子有矮腳桐、高腳桐、十柄桐、燈台桐、窩板、平板等，而其收穫量與種糧食作物的價值懸殊也很大。天星鄉農民李亞清種元蘇一點一五畝，年產一百二十斤，價值六十元，如按其價值評產入社，除投資需要三十三元七角三分外，只純收入爲二十六元二角七分；按三成分紅，則土地分紅爲十八元，勞動分紅爲八元，不符合半社會主義辦社原則，社與貧農吃虧太大，如果按其土地評產入社又損害了其本人的利益，所以，採取按其品種質量好壞，年限長短，折價歸社，按其同等土地適當照顧其土地加工評產入社。桐、楓、茶樹等則按其品種質量以四季實產照顧「上坡」、「紅山」、「下坡」等情況評產入社，桐楓費工少，多以「四六」分紅，茶葉費工大，多係「三七」分紅，未結桐楓的小樹採取付給代價歸社。

在勞動土地分紅問題上，全縣從河谷到高山，各地投資大小差別很大，經過許多社選擇典型戶試算的結果，河谷和二半山區一帶只是投資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二十五，高山和高寒山區由於地廣收入少，有的無施肥習慣種「白籽」，有的有施肥習慣，所以，差異很大，因此，根據投資的不同情況來決定勞動土地分紅的比例，河

僮族人民有了本民族的 文字

丘 挺

新創立的僮族文字方案（草案）已經在12月10日公佈了，準備在明年1月起，在桂西僮族自治區六個縣進行重點試驗教學，10月開始正式推行。這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史上新的一頁。也是各族人民共同歡慶的大喜事。

僮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六百六十萬勤勞勇敢的僮族人民，有着光輝的革命歷史，他們曾經進行過反抗民族壓迫者的鬥爭，他們參加過太平天國革命，他們建立過右江蘇維埃政權。僮族的文化是多采的，青年男女唱起民歌來是通宵唱不完的，他們歌頌本民族光榮的歷史，歌頌對敵鬥爭和勞動生產的故事，歌頌自由和愛情。僮戲有它獨特的風格。僮族的扁担舞、撈蝦舞是很有名的。但是，這些光榮的歷史和多采的民間創作，由於沒有文字，不能把它記載下來，多少世代以來靠口頭流傳，這就限制了它的發展。

多少年來，僮族人民日夜盼望着有一天能夠出現代表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在解放以前，曾經有些僮族知識分子想為本民族創造文字。但是，那時在反動政權統治下，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和協助；也曾經有人想用改良主義的辦法，用僮話來讀漢字，作為掃除文盲的一種補助辦法，結果也失敗了。

只有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和幫助下，僮族人民的願望才得到了實現。

1952年2月，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派了袁家驊教授等到桂西，開始僮語調查工作；1954年9月，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又派出語文工作者和桂西僮族自治區僮文研究指導委員會幹部共同組織